

1

导论：体制转轨的新阶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

1.1

引言

当代的中国，正处在巨大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之中，其基本内容集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原有制度结构中某些安排的局部改变，而是整个制度结构的全面改造；不是只对现行制度规则的运行过程作边际上的微调，而是全部经济秩序和经济生活的重塑和再造。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渐进而有序的制度变革和迅速而稳定的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和发展道路，即通常所说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中国今天的发展局面，奠定了中国在下个世纪进一步前进的基础。因此，改革开放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是人们谈论最多和参与最广的事情，也

拨动了世界上很多人的神经，不论是欢迎，还是反对，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将近 19 个年头，这期间，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乃至每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产权结构到市场组织和市场体系，从政府行为到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从思想观念到道德基础，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构造了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因此，要考察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探寻经济稳定增长的途径，解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必须从对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推进过程的分析做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宏观政策决定中面临的新问题，是以体制转轨所处的新阶段为其制度前提的。

1.2

从分权化体制到“二元混合体制”

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整个 80 年代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经济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分权化的公有制经济；进入 90 年代特别是 1992 年以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权化公有制经济只能描述它的一个方面和某一部分，而不能概括它的全貌。两个阶段的特征和区别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产权结构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从产权结构来看，改革中断和改变了中国经济国有化单一发展的格局，开创了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在 80 年代，虽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其规模尚小，在经

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大。不仅如此，由于发展的空间较大，非国有经济处于一种拾遗补缺的地位，未能对国有经济的发展构成竞争的威胁。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状态。当时的中国经济，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力量仍然是国有经济。不过，这时的国有经济已与改革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变化的中心是国有经济的放权让利。其结果是打破了中央集权式的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形成了公有制经济的分权化体制。按照现代产权理论，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权和控制权，而所有权集中体现为剩余索取权。放权让利的结果，使国有经济的剩余索取权一分为三：中央仍然是国有经济的公有权主体，但不是唯一的主体；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后，地方利益独立化，地方取得了国有经济的一部分剩余，形成了地方的公有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后，企业留有了国有经济创造的一部分利润，形成了企业的公有产权。这样一来，尽管表面上仍然是国有经济，但是，分权化过程中发生的交易和谈判行为，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内部结构，为经济的运行和经济变量的决定注入了新的因素。

90年代，中国国有经济分权化的格局依然存在，但是，最重要、最突出的现象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国有经济通过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以及包、租、卖等方式，发生了进一步的嬗变，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股份的比例也在下降，一部分已经变成了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和过程的积累，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在国家财政预算收入中的比重也占35%左右（参见表1-1），其经济运行和经济变量决定中的作用已经发展到可以与国有经济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不仅如此，由于资源总量一定，由于发展空间和条件的限制，非

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围绕着生存空间和发展资源的矛盾和争夺突现出来。在非国有经济的竞争压力下，国有经济由于制度上的缺陷而陷入了困难的境地。中国宏观经济的制度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有经济及其分权化体制已经不能完全和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经济运行。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供新的理论解释。鉴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具有完全不同的产权基础，我们把 90 年代中国经济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二元（或二重）混合体制”。

表 1—1 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中国有和非国有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

单位：%

年 份	1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国有工业	77.6	76.0	64.9	56.8	56.1	54.6	52.9	48.1	43.1	40.1
非国有工业	22.4	24.0	35.1	43.2	43.9	45.4	47.1	51.9	56.9	59.9
来自国有部门的税收	80.9	85.4	73.2	72.2	70.2	70.2	67.9	66.1	65.2	65.7
来自非国有部门的税收	19.1	14.6	26.8	7.8	29.8	29.8	32.1	33.9	34.8	34.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年版）有关资料计算。

从市场发育来看，80 年代，在坚持计划经济和引入市场因素的方针下，改革的重点一直落在放开商品市场、放开产品价格方面，要素市场的发育刚刚起步。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力量尚小，而国有经济随着放权让利的开展虽然具有了追求自己利益的动机，但却没有形成相应的行为约束，特别是财产约束，负盈不负亏、隐瞒盈利、转嫁负担成为国有企业普遍的行为方式，因而也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中国的市场环境还呈现出一种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双轨形态，中国的市场结构还基本上处于一种高度的政府垄断和过度的市场竞争并存的状态。

进入 90 年代，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和确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速，90% 以上的产品价格先后放开，商品市场已经形成，同时各种要素市场也逐步开放，货币市场已经启动，资本市场开始发育，外汇市场已现雏形，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以争取复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开始与国际经济接轨，一个仿真的市场环境已经基本形成。非国有企业和转制后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国有独资企业）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但是，由于产权改革和政府改革的滞后，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就具有了二重的性质和混合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市场条件下的两种产权制度，或者说两种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将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结构称为“二元混合经济”，是为了与西方教科书上所说的“混合经济”相区别。

“混合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凯恩斯提出来的，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唯一的切实办法就是扩大政府职能，“让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互相合作”。汉森在《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1941）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他指出，19 世纪末期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因而成了公私混合经济，或者称作“双重经济”。萨缪尔森在《经济学》（1985）中，把混合经济看作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同时对经济发生作用、实行控制的经济。从上述理论家的解释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来看，构成混合经济基础之一的“社会化”的经济，在生产上是指国有企业，在收入和消费上是指公共卫生、低租金住宅和社会安全与福利开支。这里的关键在于“国有部门”或“国有企业”的性质。私有制经济中

的国有部门或国有企业，是指全体作为私有者的公众将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权利，交给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国家统一行使，由其经营和使用这部分资产。这类部门或企业主要从事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促进收入平等、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因此，在这种混合经济中，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其产权基础是一样的。但是，在公有制经济中，其基本的经济关系是，人们共同占有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因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和私人部门具有不同的产权基础。此外，国有部门的规模和范围以及社会成员在其中的权利也不相同。可见，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不是西方教科书中所说的那种混合经济。

1.3

总供求的决定及其相互关系

1.3—1 分权化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及其分析

既然在 80 年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变量决定的基本力量是国有经济，其特点是分权化体制，那么，公有制宏观经济分析，特别是公有制分权化体制下的宏观分析，就可以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作出基本的解释。对此，我们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樊纲、张曙光等，1990）中已经作了分析。为了便于进行比较，这里，我们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的分析略作概述。

众所周知，在现代经济学的宏观分析中，其基本的分析角度和出发点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决定需求形成。主要的分析工具是正 45° 图（参见图 1—1）。因为在私有制经济中，一切收入（包括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都是个人收入，个人收入用于投资即

形成投资需求，个人收入用于消费即形成消费需求，二者之和就构成总需求。然而，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基本的社会矛盾是人人既是所有者，又不是所有者，因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只能以一个劳动者和消费者的面目出现，不能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个人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只限于劳动收入，没有财产收入，个人收入的支出也只能用于消费，不能用于投资。因而，个人收入的支出无法决定总需求（既包括消费需求，也包括投资需求）的形成。公有制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计划者的公共收入决定的，而公共收入是在收入分配中形成的。因此，在公有制经济中，是收入的分配而不是收入的支出决定需求形成，即国民收入分成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的比例决定了总需求的结构及其规模。特殊的分析角度决定了主要的分析工具是负 45° 图（参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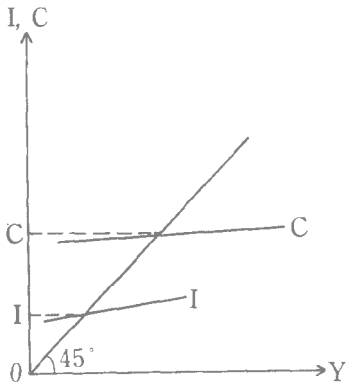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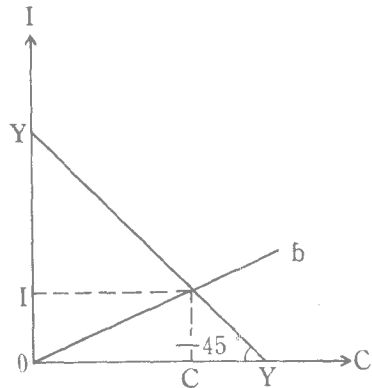


图 1-2

既然是收入分配决定需求形成，那么，分配机制就是一个主要问题。改革以前的分配机制是计划者集中分配机制，只有计划者有权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其他主体虽然可以发表意见，提出要求，但是，没有计划者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国

民收入分成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的比例。也就是说，除了计划者以外，其他行为主体都没有参与决定收入分配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的高增长意向及其作用，宏观经济的波动基本上都是由于投资需求的膨胀造成的。改革以后，形成了分权化体制，分配机制也从计划者集中决策变成了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决策，地方和企业取得了收入分配和收入支出的自主权，个人也具备了对收入分配施加影响的条件。原来归计划者单独掌握的公共收入，进一步分解为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企业收入。个人收入虽然还是只限于劳动收入，但是，分权体制为个人高消费意向的实现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由于计划者对货币工资的发放实行控制，地方和企业就采取新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收入分配和支出自主权，于是实物发放和实物收入随之形成。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在分权化体制下，由于各个主体之间的收入争夺，由于地方和企业取得了实际的货币发放权，形成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因而在价格逐步放开的情况下，出现了通货膨胀加剧的宏观经济格局。

1.3—2 “二元混合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

90年代，随着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二元混合体制”代替了分权化体制，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式和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分权化公有制仍然是现有制度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上一节分析的一些经济现象依然存在。但是，新体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是两种不同的产权形式，具有不同的产权结构，其运行方式和经济流程也不一样。在国有经济中，是收入分配决定需求形成，即全部收入分成计划者的公共收入 and 个人的劳动收入的比例，决定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在非国有经济中，是收入支出决定需求形成，全部收入都是个人收入，个人收入的支出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因此，在“二元

混合体制”下，社会总需求的形成，既不是由收入分配单独决定，也不是由收入支出单独决定，而是由二者一起共同决定。既然如此，我们的讨论就既要考察收入分配，又要分析收入支出，并把二者综合起来。我们的分析工具也需要把正 45° 图和负 45° 图结合起来（参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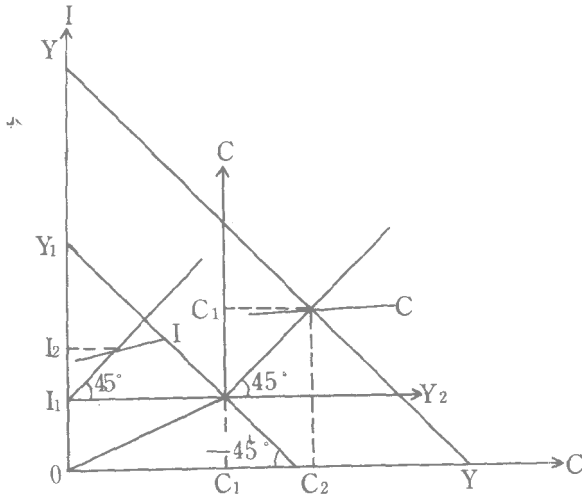


图 1—3

从收入分配来看，不论是在国有经济中，还是在非国有经济中，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分配都有着重要意义。对前者来说，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分属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因而不论是在宏观分析中，还是在微观分析中，分配本身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后者来说，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同属于一个行为主体，分配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微观分析中，在宏观分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收入的支出。正因为如此，问题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分配，而且在于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内部的分配和使用。

由于存在着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区别，财产收入首先分

解为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在“二元混合体制”条件下，公共收入作为国家财产收入的性质及其决定投资需求的作用没有变化，但其绝对和相对规模却在明显变小。其原因主要在于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争夺，在于非国有经济依靠国有经济而发展。因此，在投资需求的形成中，公共收入的地位和作用随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而下降。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深感国家注资不足，很多企业甚至长时间得不到国家投资。与此相反，个人、法人的财产和收入的增长却十分迅速，其支出在总需求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由于目前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上的缺陷，使用现有的统计资料根本无法分析和说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出新的概念和指标，并相应地对有关资料作出估计。

在现行统计制度中，财产收入以及与之相应的投资支出是按照各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性质统计和计算的。即使是居民个人的投资行为和投资决策，如储蓄及购买股票、债券等，如与国有经济单位的投资活动联系起来，就成了国有投资；与其他经济单位的投资活动联系起来，就成了其他经济成分的投资。只有在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投资活动中，才为个人的投资活动和投资决策留下了一块极其有限的活动空间。这样的统计理论和统计制度虽然符合人们的传统观念，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使那些坚持国有经济主体论者得到宽慰和支持，但却难以解释投资需求的形成问题。这里的关键是缺乏一种“财产人”的概念。

所谓财产人，就是指投资资本的初始所有人。一个国有经济单位的资本投资，只要是来自政府的拨款和贷款，来自国有资本的利润，其财产人就是国家或政府，这样的投资就是国家投资或政府投资。除此之外，其财产人就是个人和法人，由此而形成的投资就是个人投资和法人投资。这里的国家投资或政府投资概念与现行统计体系中的国有投资不同，为了区别，我们以下统称为政府投资；个人投资和法人投资的含义和范围也与现行统计体系

中的非国有投资有着本质的不同。据此来考察我国 90 年代的经济运行和投资决定与需求形成，也许更符合实际，更有意义。

根据理论上的合理性和资料的可获得性，我们的估算只能采取倒推的办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分析支出来推算收入，二是从确定政府投资来推算个人和法人投资。具体做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按资金来源分类的资料包括五项：（1）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2）国内贷款投资；（3）利用外资投资；（4）自筹资金投资；（5）其他投资。其中，（1）为政府资本投资，（5）为个人和法人资本投资，（2）、（3）、（4）则包括政府投资与个人和法人投资两个部分，需要予以分解。

国内贷款投资。按现行指标解释，国内贷款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和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主管部门拨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我们把建设银行的代理政府投资和代理贷款作为政府的固定资本投资（1994 年以后，这部分业务活动转入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将其从全部国内贷款中扣除即得个人和法人的资本投资。

利用外资投资。现有投资来源栏内的利用外资部分无法作出区分，我们假定政府借款全部属于政府的资本投资，其余部分则作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属于个人和法人投资的范围。

自筹资金投资。按照现行统计说明，自筹资金包括上级主管部门、地方和本单位自己筹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这部分资金的来源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预算外资金，也包括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以及各种集资、摊派等筹得的资金。根据财产人的概念以及预算外资金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将其中用于投资的部分作为政府的资本投资，将剩余部分作为个人和法人的资本投资。

根据以上分析和说明，我们对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资本形成作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和区分，其结果参见表 1—2。

表 1-2 我国投资资本的构成

单位：亿元

年 份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 固定资产投资		2453.2	4496.5	4137.7	4449.3	5508.8	7855.0	2457.9
a. 国家预算资金		407.8	410.0	341.6	387.7	373.0	334.2	463.9
b. 国内贷款		510.3	926.7	716.4	870.9	1292.2	2152.0	2925.8
b1. 代理政府投资	88.8	24.5	101.7	86.7	119.2	195.3	108.7	141.6
b2. 代理贷款		70.3	309.2	111.7	157.9	146.2	254.8	185.8
b3. 非国有 投资贷款		415.5	515.8	518.0	593.8	950.7	1788.5	2598.4
c. 利用外资		96.5	259.0	274.2	278.3	316.3	457.1	907.3
c1. 政府借款	43.0	29.2	138.6	144.1	178.2	180.1	208.9	309.0
c2. 其他外资		67.3	120.4	130.0	100.1	136.2	248.2	598.3
d. 自筹资金		1533.6	2900.9	2355.5	2329.5	2878.6	4024.6	6218.8
d1. 预算外 资金投资		571.3	815.3	864.9	925.9	1054.5	1343.6	1712.8
d2. 其他自筹		962.3	2085.6	1490.6	1403.6	1824.1	2681.0	4506.0
e. 其他投资				450.1	583.0	648.8	887.0	1942.1
2. 国有流动 资金投资	36.7	27.9	48.9	68.9	57.2	59.6	54.5	68.5
3. 政府资本投资		1131.0	1823.7	1617.9	1826.1	2008.7	2250.2	2881.6
4. 个人和法 人投资		1445.1	2721.8	2588.7	2680.5	3559.8	5604.7	9644.9
5. 政府与个人和 法人投资之比		1 : 1.28	1 : 1.49	1 : 1.60	1 : 1.47	1 : 1.77	1 : 2.49	1 : 3.35

注：(1) $b_3 = b - b_1 - b_2$;(2) $c_2 = c - c_1$;

$$(3) d_2 = d - d_1;$$

$$(4) 3 = a + b_1 + b_2 + c_1 + d_1 + 2$$

$$(5) 4 = b_3 + c_2 + d_2;$$

(6) 1993 年因预算外资金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为前后对比,我们用前 4 年相应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了国营企业和主管部门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并根据前些年的实际情况,假定其用于流动资金投资的数量为 50 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3、1995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中国金融年鉴 1994》,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4 年版;《建设银行改革开放以来简明资料》。

计算结果表明,1985~1993 年,政府的资本投资增长了 1.55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2.4%,而个人和法人的资本投资增长了 5.67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26.8%,是前者的两倍多。因此,二者的比例从 1985 年的 1:1.28 变为 1991 年的 1:1.77 和 1992 年的 1:2.49 到了 1993 年 则变成 1:3.35。可见,进入 90 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是个人的大量资本投资。

与财产收入分解为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相对应,劳动收入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竞争的发展,国有经济陷入困境,一大批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很多国有事业单位也因经费不足而难以维持。与此同时,一些非国有单位纷纷出现。在一部分国有单位职工离开国有单位进入非国有部门的同时,很多国有单位职工搞起了第二职业,几乎所有的国有单位都在千方百计地组织创收,都在以各种名目经常向职工提供现金和实物福利。于是,个人的劳动收入也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所在单位取得的正式收入或规范收入,一部分是从本单位和第二职业中取得的非正式收入或非规范收入,而且很多人的非正式收入大大超过了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的总规模究竟有多大,没有现成的统计资料,也很难统计,我们试图通过如下办法

作一点粗略的估算。

推算的具体办法是先计算出总收入和正式收入，再推算出非正式收入。我们用城镇居民消费总支出、新增储蓄和手持现金之和作为城镇人口的总收入，用职工的工资总额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作为正式收入，二者之差即为非正式收入。估算结果参见表 1—3。^①

表 1—3 我国职工的非正式收入估算表

单位 亿元

年 份	正式收入 ^①	城镇新增储蓄	城镇消费支出 ^②	非正式收入	比例(%)
	1	2	3	$4=3+2-1$	$5=4/1$
1978	569.8	19.8			
1980	778.6	79.9			
1985	1434.7	281.2	1689.3	535.8	37
1988	2441.4	591.6	3164.1	1314.3	54
1989	2743.9	1075.6	3577.1	1908.8	70
1990	3094.6	1457.8	3861.1	2224.3	72
1991	3501.6	1598.3	4440.4	2537.1	72
1992	4166.4	1887.2	5411.7	3132.5	75
1993	5292.3	2949.2	7039.8	4696.7	89
1994	7363.1	5075.5	9780.4	7492.8	102

系职工工资总额与私营和个体劳动者工资性收入之和，私营和个体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系根据该年全国平均工资和就业人数推算；

城镇消费支出总额为城镇家计调查中每人年均消费支出与城镇人口

因未得到居民手持现金的资料，这里的估算未计算在内。居民储蓄存款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公款私存部分实际上构成了个人的非正式收入。

的乘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3、1995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资料计算。

估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的正式收入增长很快，1985~1994 年增长了 4.13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5.2%。然而，非正式收入增长得更快，同期增长了 12.98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29.2%，是前者的 1.92 倍。80 年代，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依靠正式收入，而正式收入也基本上都用于生活消费，少量储蓄只是延期消费而已。非正式收入很少，只相当于正式收入的 30% 左右，在弥补正式收入不足以满足消费支出以外，没有多少剩余。再加上当时非国有经济的规模很小，资本市场也未发育，个人投资也无正式渠道可走。刚一跨入 90 年代，非正式收入与正式收入之比就超过了 70%。到了 1994 年，非正式收入超过了正式收入。正因为如此，非正式收入的支出不仅决定着消费需求的形成，而且对投资需求的决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4

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形成

随着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变量决定方式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和态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分权化公有制条件下，国有经济不仅在经济运行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且还在继续迅速发展。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就业规模都在扩大。一方面，在城镇就业的人员，60% 以上进入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劳动力的利用也比较充分。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多余人员，但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多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得到利用，不会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的

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经济运行和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问题。

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总的就业规模继续扩大。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随着“二元混合体制”的逐步形成，非国有经济和非国有部门继续扩大，迅速发展。一方面，非国有部门代替国有部门吸收了城镇就业人员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农村的隐蔽性失业也在明显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第二职业的发展，城镇中的劳动力资源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利用。然而，由于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陷入了比较困难的境地，很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一部分国有企业关门停产，一部分国有企业开工不足，公开失业和在职失业的人数大量增加。1994 年，虽然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人数为 476.4 万人，失业率为 2.8%，但是，据有人估计，国有部门的失业人数约为 600 万，在职失业人数有近 2000 万，按此计算，我国城镇的失业率为 14.9%^①。可见，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除了农村以外，主要是国有部门的问题，带有明显的体制特征和结构特点。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城市倾向，城镇的高失业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整个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 80 年代不曾出现的问题。

在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的激烈竞争中，国有经济由于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不足，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债务负担沉重，资产负债率平均为 70% 左右，很多企业超过了 90%，而国家又无力注入新的资本，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也因注资不足而陷于困境；二是冗员充斥，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着落，想死死不掉，想活活不了，只好不死不活地空耗着。为了保持社会

^① 本人的估算与一些调查所得的结果基本一致。据《中国 1 年报》记者在沈阳的调查，1995 年，沈阳下岗职工约有 30 万，占职工总数的 12.5%，再加上登记失业人口，失业率大约在 15.5% 左右。参见毛浩等：《走进沈阳》，《中国青年报》1996 年 2 月 5 日。

安定，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政府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给陷入困境的国有部门输血。但是，一方面，由于国有部门的效率低下，增加的资金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仅扩大了需求，而且抬高了成本，使得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参见表 1—4）^④。同时也使得通货膨胀具有了成本推动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投向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出现资金困难，于是凭借着灵活的机制，千方百计地到国有部门去挖。在资金再次流向非国有部门的过程中，资金成本提高了。目前，实际的资金成本一般均在 20% 以上。这也是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筹资成本高会抑制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这种情况对经济增长是十分不利的，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

表 1—4 1991~1995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经济增长率 (%)	9.5	14.0	13.3	11.6	10.2
通货膨胀率 (%)	2.9	5.4	13.2	21.7	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年版。

以上的分析表明，90 年代的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一种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态势。但是，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又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不同。70 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同时，经济也出现停滞或衰退，甚至出现负增长。而中国经济仍有生气和活力，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八五”时期年平均超过 10%（参见表 1—4）。因此，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三高”，即高增长、高失业和高通胀。

正是由于中国的“三高”与发达国家的“滞胀”不同，其形成的制度背景也不一样，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理论